

第六章 結論

在明末思想界眾多批評與救正王學流弊之聲浪中，無庸置疑地東林學派是其中最具代表性者，而高景逸則是此派之重點人物。

《明史·高攀龍傳》贊高景逸為「一時儒者之宗，海內士大夫識與不識，稱高而無異辭」¹，表明了景逸於明末學術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與影響。

首先，從景逸的心性論而言。景逸標舉「性善」說以駁斥陽明所言「無善無惡心之體」，強調「善」是天地生機流行所賦予人而為其性；以善為元，點出有善而後有性，作為道德價值的總根源；另一方面，將天理、心、性歸結為一，萬事萬物之理與心並無隔、無分際，從這點來看，景逸的心性論實較傾向陽明之學；其次，就景逸的工夫論來看，其強調朱子的格物致知之說，要求為學須窮究一草一木之理，看似完全承襲朱子，然而景逸在心、物合一的基礎上，直指格物便能體現事物的天理，即至善之理，則又非朱學內涵，因此黃宗羲指出高景逸兼有朱學與王學色彩，實為確論。值得注意的是在兼取朱、王之學的基礎上，所提出重「修」重「悟」的修養工夫，疏解《大學》格致知本之意，使修身的意義不僅限於自身，更須推廣到自身之外的事物上，要求實際的躬行於生活日用之中。

¹ 清·張廷玉編纂：《明史·高攀龍傳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，卷243，列傳第131，頁6314。

依此心性論及工夫論，高景逸實學思想的具體主張，可由傳衍並弘揚東林書院「躬行實踐」為教法，以及講學與議政的結合二點呈現。前者除要求聖人之學必須讀書之外，更要求必須以「有用」於世事為標準。換言之，也就是必須能「通百姓日用」；且藉由問學培養氣節，亦是其所著重之處；至於後者，則是由講求「有用」之學所延伸的必然趨向。既重視學以致用、濟物利人，那麼，純粹以天理性命作為講學內容必然不能滿足其理想，因此，講論世道人心，評議政治，便成為書院講會的另一內容。由此看來，這種務實致用的思想，便不能單純地以為只是矯正王學，或承襲朱子格物之說了。

錢穆先生將以顧涇陽、高景逸為首的東林學派視為開啓清初顧炎武、黃宗羲經世濟民學風的重要依據，實具有深遠之意義。而高景逸承顧涇陽之學，又進一步深化心性論、工夫論等思想，使東林學派之精神及學風得以延續，更有其不可忽略的地位。黃宗羲曾云：

此先生甲寅以前之功如此。其後涵養愈粹，工夫愈密，到頭學力，自云心如太虛，本無生死。劉先生(宗周)謂先生心與道一，盡其道而生，盡其道而死，是謂無生無死，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。

黃宗羲這段話語，說明了高景逸在學術上的特出之處。

當然，景逸的氣節操守，也成為明末士子心中的必然形象。其言：

氣節而不學問者有之；未有學問而不氣節者。若學問不氣

節，這一種人，為世教之害不淺。²

晚明「東林八君子」³，其中之一即為高景逸，蕭敏如在其論文著作中即提到：「在東林學派活躍的時代，他們的『君子』形象極為鮮明，而他們『以道義名節相觀摩』⁴的『氣節』形象，更根深蒂固地烙印在知識分子心中。」⁵而這樣的精神，在明季覆亡之時，影響豪傑志士的競相效法，在在都體現了景逸砥礪氣節的影響。⁶

² 高景逸：〈會語〉，《高子遺書》，收於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，1983年）卷5，頁420。

³ 清·張廷玉等撰：〈葉茂才傳〉：「時稱『東林八君子』（顧）憲成、（顧）允成、（高）攀龍、（安）希范、（劉）元珍、（錢）一本、薛敷教及（葉）茂才也。」（《明史》卷231）

⁴ 清·高廷珍輯：〈許靜餘先生傳〉，《東林書院志》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68年）卷之8。

⁵ 蕭敏如：《東林學派與晚明經世思潮》（台北：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3年1月），頁155。

⁶ 有關這些豪傑之士，如史閣部（可法）、黃陶菴（淳耀）、張蒼水（煌言）、瞿起田（式耜）等具壯烈之精神。至明亡後，諸遺民不肯出仕，隱居山野。如夏峰、黃梨洲、顧亭林、李二曲（顥）、王船山（夫之）、朱舜水（之瑜）等。